

大学教师身份建构的性别向度

——基于一所研究型大学女教师的叙说分析

王 珺 宋文红

摘 要: 大学教师在身份建构过程中呈现出明显的性别向度。从一所研究型大学女教师的叙说中发现:大多数女教师在漫长的社会化过程中,主动认同了社会赋予她们的母性、关怀与亲和力,从而觉得“教师身份”和“教学工作”与自己的“本质”具有高度的同构性,而对“学者身份”与“科研工作”存在明显的疏离感。这一认知深刻影响了女教师在大学中的身份认同与身份确立。

关键词: 大学教师;身份建构;性别向度;叙事研究

DOI 编码: 10.3969/j.issn.1007-3698.2013.05.004

收稿日期: 2013-06-25

中图分类号: G77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3698(2013)05-0022-06

作者简介: 王珺,女,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教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学、教师教育、性别研究;430079 宋文红,女,中国海洋大学高教研究与评估中心、教学支持中心教授,教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管理与评估、比较高等教育。266100

基金项目: 本文系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国家一般课题“高校教师专业化发展及其组织模式:国际经验与本土实践”的部分研究成果,项目编号:BIA08003。

一、前言

在所有的社会中,个人身份都交织于权力。因为每个人所建立的身份作为一种社会动力会有力地影响其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以及他改变这种结构的能力。因此人类学家里克·沃尔夫(Eric Wolf)在他的权力理论中,把其第一权力模式定义为“个人所固有的潜力或能力”,即权力决定一个人的自身能力和身份,而个人的身份又使其在三个层面上获得权利:经济自主、组织的权利与各种资本的获得。

在大学中,特别是在研究型大学中,“教师”与“学者”已然成了一个没有边界的概念。从中世纪大学到柏林大学,再到霍普金斯大学,从科学实验室的建立到研究生教育制度的形成,再到研究型大学的声誉日隆,大学教师在质疑和批判中进行知识的创新和增长,形成了特有的思维方式,同时,在对社会责任的担当中也塑造着知识的良知和社会的良

心。这里,“教师”与“学者”的身份已经浑然一体。

但如果我们把“大学女教师”这一身份单独剥离出来,却发现诸多吊诡之处:教师的身份呈现出明显的性别向度,“女教师”与“学者”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在经验层面,二者都很难达到和谐统一。由于性别的因素,“教师”对女性而言,似乎具有明显的关怀、照顾的作用,它是传统女性气质的延伸;而“学者”及其“象牙塔式”的生活方式则与知识的创新、科学严谨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它与女性的“本质”相去甚远。“学者”与“教师”对女教师而言,不仅仅是一个概念上的区别,她们以何种身份在大学中“存在”,往往会决定其是否能获得人际关系、学术网络、学术资源等重要社会资本;也正是由于身份的差异,才导致了更为重要的资本、利益和权力分配上的差异,同时也成了造就大学教师专业发展中性别差异的历史与现实的重要因素。

从早期由荷兰特温特大学高等教育研究中心

的安德斯·朱根教授组织完成的一项关于《欧洲学术人员就业和工作条件》的研究^①,到1991—1993年由欧内西斯·博耶和菲利普·G·阿特巴赫教授先后主持、卡耐基教学促进委员会开展的关于14个国家和地区国际学术职业的大调查^②,再到目前正在开展的由美国福特基金会资助的“学术职业变革”国际调查与研究项目^③,以及1996—2002年一项由加拿大国际开发署(CIDA)资助的国际合作课题“作为教育发展的动力:妇女和少数民族”^④,还有几项由中国国内学者开展的对女教师的专项研究^⑤,这些关于性别的调查、统计与分析,似乎都无一例外地说明了高等教育中女性参与的局限性以及女教师身份的纠结与发展路径上的“玻璃天花板”(Glass Ceiling)现象。

那么,大学教师身份的建构是如何显现出性别向度的?本研究将以Z大学为研究个案,以对女教师的质性访谈资料为分析文本来阐释这一议题。

二、研究设计

本研究的田野资料和访谈对象均来自Z大学,主要通过目的性抽样和理论抽样两种方式获取样本。Z大学是教育部直属首批“211工程”和“985工程”重点建设大学,理工学科是其强项和优势,在当前国内一些组织机构的大学排行榜上,Z大学一直名列前茅。Z大学为自己制订的战略目标是:建设成为一所“研究型、综合性、开放性的世界知名高水平大学”。从2002年开始,该校对薪酬分配、住房、医疗等制度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2004年又实行了教师聘任制的改革。Z大学的发展与改革在中国高校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本研究选取了Z大学16位女教师作为深度访谈对象,她们分别来自理科、工科、文科、管理、医学

等8个不同院系,年龄从29岁到65岁。表1是样本中16名教师的基本情况,出于保密原则,所有人名都使用代码。根据研究的需要,对某些人的个人情况,笔者作了一些技术上的改动。

三、女教师的身份确立: “教师”还是“学者”

从受访者的叙说中发现,即使是研究型大学的女教师,不管是基于什么原因选择了教职,绝大多数更注重自己的“教师”身份,而普遍对学术工作的主观意愿不高。即使有几位学术发展较好的教师,也认为自己是一个“被动的研究者”、“热情而敬业的教师”。^⑥在访谈者中,只有一个个案明确强调自己在学术研究里享受到了乐趣,而对教学工作兴趣索然。该被访者是一个丁克家庭的成员,在访谈中,她有意略去了生活故事的一部分,笔者没有就其中的因素进行进一步调查与分析,在此不能妄谈因果。在女教师对“教学”的认知上,笔者的田野调查结果与华中科技大学教科院沈红教授主持的福特基金会资助项目“学术职业变革国际调查与研究——中国案例”所显示的调查结果大致吻合。该数据显示:大部分女教师认为自己的工作兴趣是教学与研究,但更倾向于教学,而男教师更倾向于研究,女性虽然对教学更感兴趣,但评价体系的制约使她们必须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研究上。^①

作为大学教师,教书育人和学术研究无疑是其天职,访谈中没有人否认这一点。但谈到“学者”这个身份,好几位女教师,特别是由于科研成果有限、长时间停留在“副教授”或“讲师”这个层级上的教师都有些许的尴尬,C甚至明确地说:“我有些害怕学者这个称呼。”有趣的是,几乎所有的受访者都对她们作为“教师”的身份认同度非常高。当问及她们

① 研究成果参阅 Enders Jurgen, Ulrich Teichler: A Victim of Their Own Success? Employment and Working Condition of Academic Staff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Higher Education 34, No.3(1997).

② 研究成果参阅菲利普·G·阿特巴赫的《失落的精神家园——发展中与中等收入国家大学教授职业透视》,施晓光主译,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菲利普·G·阿特巴赫的《变革中的学术职业——比较的视角》,别敦荣主译,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③ 这一项目的中国部分由华中科技大学沈红教授主持,研究成果为《变革中的学术职业中国大陆高校的调查》。

④ 这项调查与研究的成果主要体现在子项目负责人、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张晓明的博士学位论文《学术参与——中国高等教育进程中的妇女》中,2003年。

⑤ 国内对女教师的调查成果主要有以下几项:由上海师范大学主持的项目《上海市高校女知识分子地位调查研究》,参阅裔昭印《社会转型与都市知识女性——来自上海高校的研究报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由中华女子学院主持的项目《面向21世纪中国女性高等教育研究》,参阅安树芬《中国女性高等教育研究》,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⑥ “被动/主动的研究者”与“热情而敬业的教师”这两个评价都来自叙述者,在此直接引用了叙述者的概念。

表1 研究对象情况简介

姓名代码	性别	学历学位	职称	学科	年龄	婚姻及子女个数	行政经历
A	女	本科	教授(博导)	工科	65	已婚(2)	有
B	女	硕士	教授	文科	58	已婚(1)	无
C	女	硕士	副教授	理科	54	已婚(1)	有
D	女	博士	教授(博导)	文科	53	已婚	无
E	女	博士	教授(博导)	工科	53	已婚(1)	有
F	女	硕士	副教授	管理	52	离异(不详)	有
G	女	硕士	副教授	工科	49	已婚(1)	有
H	女	博士	教授	医科	52	已婚(1)	有
I	女	博士	教授	工科	44	未婚	无
J	女	硕士	讲师	文科	39	已婚(1)	无
K	女	博士	副教授	文科	38	已婚(1)	无
L	女	博士	副教授	工科	38	已婚(1)	无
M	女	博士	副教授	文科	35	已婚(1)	有
N	女	博士	讲师	工科	34	已婚(1)	无
O	女	硕士	讲师	文科	29	未婚	无
P	女	博士	副教授	工科	46	已婚(1)	无

愿意被称为“某教授”还是“某老师”时,有12个受访对象(占受访者的80%)肯定地说:“还是老师好,又亲切、又朴实而且没有压力。”这些相似的回答中一定具有丰富的内涵,带着对这个问题的好奇,许多女教师与笔者分享了她们故事与想法。访谈对象之一——K慷慨地提供了她早年的一篇随笔,经过她的允许,略作处理摘录如下:

我没有经过太多的思索,只觉得大学生活是我熟悉的,而且我一直认为自己除了读书和学着教书之外,似乎一无所能。这样,我就懵懵懂懂地进了大学,学着做起了一名大学教师。小时候的一位闺中密友此时正在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深圳的商海中扑腾得正欢,她给我发来一份“贺信”,恭喜我走入“象牙之塔”,终于要当“学者”了。事实上,对于“学者”这个称呼,我实在陌生得很,不敢奢望自己能够获得这样的殊荣。……我所了解的“女学者”形象更多来自文学、影视作品,那是一些大同小异的“准男人”模样或者是非常可笑的、戴着厚厚镜片的“马列老太太”形象,这与我心目中美好、雅致的女人形象相去甚远。我当时最朴实、简单的想法就是觉得,作为一个大学教师,对女性来说是

一个很体面的职业,如此而已。至于未来,那还是一团迷雾。^①

J是一位教基础课的教师,访谈中与她谈及“身份”问题,她说自己没有仔细考虑过。第三天,她给笔者发来短信,要笔者看她曾写的一篇博客:

学校要实行“教师聘任制”了。……系领导传达了学校“教师聘任制”的一些基本精神,我只记住了一条,好像是“凡1960年后出生的教师(外语、艺术、体育类除外),必须具有博士学位,才能升任副教授、教授”。咳!如此看来,我这两年还是没戏!谁叫我刚开始念博士学位呢?所以,我觉得只有“教师”,才让我心里稍微踏实一点,如果大言不惭地混迹“学者”行列,总有一种行骗的羞耻感。我尽管已经在这里耗磨了十余个春秋,教了数不清的学生,写了几篇所谓的文章,也做了几个不大不小、不痛不痒的项目,但哪敢妄称自己就算一个“学者”呢?听到别人说什么“学者”,我就非常汗颜,就一“教书匠”而已!^②

B出生在所谓“高干”家庭,在Z大学已经工作

① 摘自K的日记。

② 摘自J的网易博客。

了25个春秋,用她自己的话说,“Z大学的一草一木,我都认识”。B现在是正教授,担任校内校外许多专家委员会的委员,学术生涯发展应该算是比较顺利的。访谈她之前,笔者查阅了她的一些公开的个人资料,并详细地阅读了Z大学女子教育研究中心编撰的《巾帼风采录》,在该书中,B教授讲述了她奋斗的历程。笔者对她进行访谈时,谈到教师与学者的身份问题,她出乎意料地感慨道:

“我事实上更愿意当‘老师’,说自己是所谓的‘学者’,总觉得有些别扭,不适应吧。”

“为什么呢?应该说您作为‘学者’已经很合格了呀!”笔者确实有些不解。

“是的,很多人也这样认为,但不知为什么,我确实是一个很不自信的人,我觉得自己的学术生命不会再有大的起色了,早期在别人还没有意识到一些最基本的问题的时候,我做了一些编译介绍的工作,但这与我理解的学者的工作也不是一码事。我知道,到了这个年龄,基本上不会再有超越了,真的,我所做的工作自始至终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创造性,这对真正的学者来说,是非常可怕的。我确实觉得自己做学者不合格,但作为教师,我可以问心无愧。”

为何女性会对“教学”更有兴趣,对“教师”的身份更有认同感呢?也许是因为“教职”的性别化特质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女教师的选择,而这一选择又形塑了女教师的“兴趣”与“身份认同”。大多数女性在漫长的社会化过程中,主动认同了社会赋予她们的母性、关怀与亲和力,从而觉得“教学工作”与自己的“本质”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于是,“教学”就被建构成了她们骨子里熟悉的职业,教学的热情更“理所当然”地源于她们的“天然母性”。这种情景有些类似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所借用的“托马斯定理”——如果人们把情景当做是真实的,那么其结果将成为真实的,这是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这一预言可以用来解释和说明为什么值得怀疑或错误的文化观念会长期存在,并一直束缚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25]

四、教学与研究:具有性别标识的工作

教学与研究是大学工作中两种不同的实践活动,以性别标识的观点来检视,可以发现,教学乃是比较研究具有更多女性角色延伸与类似女性角色功

能的实践。一项可用的依据是,在愈少研究或创造性、愈多呵护和养育性的活动中,如幼儿园、小学中,就愈多女性工作者。早就有研究者指出,学术界往往认为女性不足以成为大学问家而将之局限于教学的角色。^[3]众多研究也显示,较少有女科学家喜欢以研究为她们的第一乐趣,她们也较男性更多被发现在从事教学而非研究或行政工作;有些研究则进一步指出,学术机构雇用女性来教书而非研究。^[4]

事实上,目前大学教师所处的教育结构也并不重视教师在情感上的劳动与付出,尤有甚者,教育体制将关怀与知识工作(Intellectual Work)分开,特别是在大学教育阶段,并不将关怀工作视为知识工作的一部分。因而许多女教师并不能通过对学生的关怀而获得或建立某种权威及满足感,反而更容易被视为“母亲”似的人物。笔者的好几位访谈对象就陷入了女性/母性特质的爱恨情仇之中,她们在女人、学者、教师等多种身份中游离,并受到权威与关怀之间关系的困扰。印象最深刻的是D教授的经历,她有些愤愤不平地感叹曾有学生用“D妈妈”称呼她,她抱怨道:

为什么女教师不能像男教师那样用自己的学问来影响学生呢?她们与学生的关系除了温情、耐心,就没有别的什么了?我不是很喜欢这一点,总觉得怪怪的,我认为自己在工作中从来没有刻意流露出所谓的女性气质,我是用自己的学问在说话,在证明我的存在,在展示自己的价值,可这些事还真是说不清楚。至于男教师,他们肯定不会有这种感觉。

笔者发现,在Z大学一项重要活动——“我最喜爱的导师”评选中,由Z大学学生撰写的获奖教师评奖词也带有明显的性别分野,颇令人玩味。如:

三尺讲台,您在传道解惑中讲述着做人的道理;早晚归十三载,二八式自行车记载了您勤奋的足迹……(一位男教师的评奖词)

她用温和的性情、甜美的微笑以及微笑背后那颗慈爱之心,画出人生最美的轨迹!(一位女教师的评奖词)^①

20世纪80年代以后,大学通过科技创新及成果转化直接介入国家经济发展的程度越来越高,并引发了大学内部组织结构与学术文化的变革。这一变革直接影响到大学及其成员的身份定位,其中最

① 资料来源: http://www.hust.edu.cn/content/content_26029.html.

显著的就是上世纪90年代后期至21世纪初启动的大学教师聘任和评价制度改革。显然,在当今高等教育的各种评价体系之下,作为一个“教师”和作为一个“学者”,其所拥有的文化资本、社会资本与经济资本是有区别的。有学者分析,现在的中国大学与计划体制下的大学相比,拥有最雄厚资本的人是那些亦官亦教亦研的“两栖或多栖型”学者阶层,他们是院长、主任或校领导,也是教授、研究员、研究生导师以及各种学会、学术委员会的委员、评委等,正是这些人构建起一个属于他们的游戏场,并制定着场域内的各项游戏规则。这就是说,一个教师要想获得良好的职业发展,他不仅要努力成为学者,最好还要成为具有行政权力的“多栖型”学者。^①

如果一位教师,仅仅满足于三尺讲台的工作,而不去努力认同并追求“学者”身份,那么,他在现代学术评价体制下就很容易被挤压到学术劳动力市场的边缘地带。J就这样感叹过:

光教教书,特别是只带本科生,你有什么资本呀,那真是一穷二白三不招人待见,现在一节课才30元。即使都是“教师”,也有教本科、硕士、博士的区别呀,而且差别大了去。要带硕士、博士,你就首先要要有科研成果,成为“学者”。^②现在研究生也功利,选导师只愿意选“当官的”、有资源的、有背景的!这样以后找工作就方便多了,老师会帮你推荐和介绍,还能参与多个项目的科研,一举几得的事。……都是老师的身份,但差别实在大,就看你当什么人的老师。

也正是因为人们对女教师的教学角色习以为常了,所以一旦有“反其道而行之”者,大家除了佩服之外,更多人往往用“像男人一样”来形容她们,使女教师处于“退亦忧,进亦忧”的尴尬境地。访谈中,一位建筑学院的女教师P就提醒笔者,她们学院的女教师大都专注教书,1/3的女教师承担了学院近一半的课程,其中本科教学70%的课程都是由女教师承担,而男教师更愿意做科研或成为一名成功的建筑师。她说:

女性教书很合适,也很方便,而做研究和建筑实务都需要得到好多有用的信息和资料,女人要获得这些确实比男性要困难很多。我们院××研究室有一位女教师,能拿项目,能出活儿,但我们都知道她与我们不

一样,也没人敢跟她比,她身上有一股男子汉气。

许多受访者的叙述似乎可以证明:不仅仅是女教师自己有兴趣教书,更认同“教师”的身份,而且学术界、大学组织以及学术职业“圈中人”也大都认同这一不言而喻的假设前提——女教师更愿意也更适合教学。^{[6]285-360}

男性往往被期望从事更多的研究工作,当然有知识论领域性别意识形态的原因,但在目前的评价体制之下,笔者以为,功利性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考量因素。在大学中,研究所带来的声望和利益要远远高于教学,从已有的研究来看,男性作为家庭的主要供养者,他们必须在事业上更有成就,所以,他们不得不把主要的精力投入研究工作之中;而女性,由于许多人投入教学工作费时较多,再加上家务劳动,严重影响了她们学术声望的获得。^{[7]64}在这里,社会等级制和权力关系实际上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被悄然性别化了,将女教师放置在教育结构里的身份、位置与社会/自我的认同都与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性别制度密切相关,因此,它不可能完全是一个教师自由选择的结果,也不可能仅仅是私人领域的事情,其中体现了生活中无处不在的微观性别政治。在这所研究型大学里,尽管也有一些可圈可点的女性学术精英,但对众多女教师而言,她们或许更关注的还只是身份和生存的“合法性”问题而已。

我只要完成学校规定的指标就行了,别的方面不敢有太多的想法,我也没有那样的精力和能力。(F)

该出成果的年龄,教学、家务、孩子、老人,一大堆事情。现在,孩子上大学了,人也轻闲了不少,但时机错过了。念博士,年纪也大了,受不了那个折腾。咳,一步跟不上,也就步步跟不上,不甘心又有什么用呢?就等着退休了。(C)

我也多想多出科研成果啊,但一大堆课要上,还有家务杂事,根本坐不下来,所以,哪还敢有太多的想法,能完成学校聘期内的任务就不错了,我的目标是不被“下岗”。(J)

在高等教育改革、新管理主义盛行的时代,大学教师,特别是研究型大学的教师,作为“教师”的身份事实上是在不断弱化的,而作为“学者”、“研究者”的身份却在不断地被强调。许多大学的教学工作除了具有逻辑文本和政策宣传的重要性外,基本

^① 虽然国际上通行的惯例是,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都可以招收硕士、博士研究生,在学术上,这些层级的人是平等的。但长期以来,在中国内地的大学,只有具有副教授以上职称者才有资格担任硕士生导师,正教授才有可能申请博士生导师资格。

上成了一个无人问津的“要塞”，而科研至上或科研主义则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这种偏差在我们所使用的语言里也可以看得出来：我们把研究看成‘机会’(Opportunities)，而把教学当做‘负担’(Load)。”^[87]已有的研究显示：女性在这个方面准备尤为不足，她们普遍对“新”的游戏规则不熟悉，或对此趋势采取消极抗拒的态度。^[9]这一点，应该引起必要的关注，否则，即使她们是高学历的精英女性，已经进入了传统的“男性职业”领域，也还是会沦为精英中的弱势群体和高伤害率的学术族群。当然，大学教学与科研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二者之间并不仅仅是互相排斥的关系，但由于此议题与本研究相关程度不高，所以，笔者在此不进行深入讨论，仅从性别的向度进行分析。

五、结语

当今时代，由于女性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大学

女教师群体的扩大已成为一种世界性现象。但与性别有关的问题，在主流的高等教育文献中并未成为一种研究关怀。事实上，在一个急剧变化的世界，全球范围内社会性别差异及不平等所表现出的广泛性、持久性及其对未来的影响已成为诸多领域关注的热点。作为“以学术为生”、“以学术为业”的女性，“研究型大学的女教师”可谓是一群传统男性领域的闯入者。现在，她们几乎占据了大学教师群体的“半壁江山”，但她们的职业发展前景并不容乐观，以往教育研究中被忽略不计的教师“性别身份”，实际上在女教师的职业发展生涯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社会性别作为大学组织中一种制度性基础的重要性并未受到学术界普遍关注的情况下，如何在大学教师发展的制度设计与政策策略上充分关照到教师身份的性别向度，在教师发展制度中建立起更平等或更有包容力的管理体制，营造和谐的学术社区，仍然是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 [1] 文雪.中国学术女性的职业发展——“玻璃天花板”的存在及其突破[D].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硕士学位论文,2007.
- [2] 沈奕斐.被建构的女性——当代社会性别理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 [3] Bernard Jessie. Academic Women[M]. Pennsylvania: Pennsylvania University Press, 1964.
- [4] Zuckerman Harriet, Jonathan R. Cole. Women in American Science[J]. Minerva, 1975, (13).
- [5] 周艳.中国高校学术职业结构性变迁及其影响[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2007, (4).
- [6] Judith Glazer-Raymo & Barbara K. Townsend, Becky Ropers-Huilman. Women in Higher Education ——A Feminist Perspective [M]. Boston: Person Custom Publishing, 2000.
- [7] Burton R. Clark. The Academic Life: Small Worlds, Different Worlds——The Carnegie Found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Teaching[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
- [8] 欧内斯特·L·博耶.关于美国教育改革的演讲[M].涂艳国,方彤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2.
- [9] Hearn J.. Academic, Management and Men: Making the Connections, Exploring the Implications [A]. Brooks & A. Mackinnon. Gender and Restructured University[M]. Buckingham: Open University Press, 2001.

责任编辑:董力婕

The Gender Dimension of Faculty's Identity Construction: Based on the Narrative Analysis of Female Teachers in a Research University

WANG Jun, SONG Wenhong

Abstract: In the process of identity construction, university teachers show a significant gender dimension. From the narrative of female teachers in a research university: in the long process of socialization, the majority of female teachers initiatively agree with the motherhood, care and affinity that the society endowed to. Therefore, they feel a high degree of isomorphism between “teacher Identity”, “teaching” and their own “essence”, while an obvious sense of alienation between “scholar identity” and “researching”. This profound perception has an impact on identity and identity establishing of female teachers.

Key words: faculty; identity construction; gender dimension; female teacher; narrative research